

上古至宋元时期方位词的语法化

张 金 平

摘要

本文旨在从语法化的角度探讨方位词自上古到近代的发展与演变。到了近代中期的宋元时代，方位词经过语法化分化成三个类型：自由不定位型，半自由定位型和粘着后置型。这种语法化是认知因素、高频使用、句法后置共同作用的结果，跨域的语义的分化、泛化和虚化是其表征。宋代所有方位词的语法化程度并不相同，有很大的差异性，主要单音节方位词的语法化程度可以排序为：上>中>下>前/后>间>内/里>外>边/旁/侧>东/西/南/北/左/右。

关键词：方位词、语法化、后置率、认知域、隐喻

1. 方位词生态系统与方位词的语法化

上古汉语语“方位词”和现代汉语的“方位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先秦汉语里，方位名词用在名词后面都有实在的意义，而一般名词表处所时也不需要加方位名词。”（李崇兴1992）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东、西、南、北、上、下、内、外、前、后、中、间”等都是单音节的名词，它们和处所名词没有什么不同，同时它们既表示方向，也表示位置；既可以单用，也可以加在名词前面或后面；名词和方位成分之间还可以加虚词“之”连接。随着处所名词的形成、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和方位后缀“边、面、头”的产生，到了近代中期，原来比较单纯的、作为名词一部分的方位词开始分化。

但我们还是把这些表方位的成分看成方位词。为什么呢？围绕方位词的争论与歧见可以运用范畴理论来解释。Lakoff（1987）指出，认知科学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发现理性是什么，也就是发现范畴是什么。近几十年来，在经典范畴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对范畴进行解释的概念和理论，其

中比较重要的概念就包括“家族相似性”和“中心程度”等。家族相似性指某一范畴的成员以某一方式互相联系，但并不全部拥有用来定义该范畴的特征；中心程度指某一范畴的某些成员与其他成员相比可以更好地作为该范畴的范例。

袁毓林(1995)指出，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词类知识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词和词之间在功能和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的概括。家族相似性有两种：(1) 基于概念的家族相似性。(2) 基于分布位置的相似性。人们会自觉地把分布位置十分相似的词归为一类，作为一个类来记忆和使用。现代汉语方位词同时拥有了这两种家族相似性：从语义上把“上”、“下”等归入“方位词”，同时分布位置也相似，不相似的地方也在“家族相似性”之允许范围内。从这点看，方经民(2004)将这些“词”统称为方位成分也是很合适的。^①

到了近代中期的宋元时代，方位词已经分化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语言单位：方位词汇成分和方位构词成分。方位词汇成分又进一步分化。这样的分化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语音分化、功能分化和构形分化。从语音形式上来看，分化为单音节的方位成分和以双音节为主的多音节方位成分；从语法功能上来看，上古汉语的方位词功能在近代多由双音节方位词承担，同时经常附在前面而有了词内成分的倾向，而后置于其他词之后则染上了方位标志的性质；从构词形式看，分化为单纯方位成分、派生方位成分（加前缀“之”的和加后缀“面、边、头”的）、以方位成分为词根的复合方位成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近代的方位成分划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 I. 自由不定位：“L + 面 / 边 / 头 / …”式派生方位成分，“L + L / 其他语素”式以方位成分为词根的复合方位成分
- II. 半自由定位：东、西、南、北、左、右、上方向、下方向、前方向、后方向、外方向
- III. 粘着后置：上、下、前、后、里、内、外、中、旁、边、间、侧，加前缀“之”的派生方位成分，上下、前后、左右，等等。

跟现代汉语方位成分系统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宋元时期还没有分化出“半粘着前加”一类。表时间的“上、下、前、后”在宋元时期位置还相对自由，可以单独使用，不是非前加不可。例如：

(1) 今日之事，若向上寻求，须用孟子方法；其次则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许下也。(朱子语类)

(2) 如公之说，则不必赠三代矣。僖祖有庙，则其下子孙当祧者置於东

西夹室，於理为顺。（朱子语类）

(3) 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错斩崔宁）

(4) 平生好善，年三十一。先丧一妻，后又娶孟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我们认为，宋元时期方位词之所以如此分化，完全是自上古至现代汉语方位系统不断语法化的自然结果。

2. 方位词语法化的动因

2.1 方位词使用的高频化

语法化是语法范畴和成分产生的过程或现象。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它比我们汉语中常说的虚化范围更广（沈家煊1994）。Bybee et al (1994) 综合了类型学和语言的历时研究，得出结论：语法化是演化而来的语法，是描写和解释跨语言语法范畴演化的手段。

语言意义和形式的演变不是毫无理据的，而是有各种动因。这些动因既包括认知，也包括语用、语义等几个方面。有的是由于交际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互动所造成，有的是语言使用者的创新，有的是因为长期误解和误用而将错就错，还有可能是因语言接触而造成。然而不管是哪种原因，语法化的发生必须是以高频率重复和固化为基础。

一个语言单位的语法化要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发的，并且具有普遍性，只有当这样的变化为大众了解、接受并使用后才能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语法化研究的学者普遍将频率看作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或因素，语言项频率的高低是由重复的频度造成的。

语言中语音、词义、形态等的发展演变都与重复有关。在重复中某语言现象的使用者被扩展，在重复中此现象又被调整和固化，越是重复，也就越有发生语法化的潜在可能性。“Bybee 强调语法化的最基本机制是重复，鉴于此，Bybee 从突显重复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角度将语法化重新定义为：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序列或语素序列自动化为一个单一的加工单位。”（吴福祥2006）

所以，我们认为发生一个语言成分语法化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使用频率越高的实词，就越容易作为语法化的始源，也就越易被虚化为语法标记，其结果反过来又提高了该形式的使用频率。重复可以导致形式发生弱化，也可以独立地使意义变得虚化。以英语 and 的语义变化为

例，它除了可表示并列关系，还可暗示主从关系。使用频率是 and 表主从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用来表示先后出现的事件所表达的关系多数是因果、条件和结果、行动和目的三大类。这些关系在 and 的表达中不断反复，使得所形成的这些语义关系的出现有较高的频率，其中条件结果、行动目的关系的频率高于认定一般因果关系的频率，所以在 and 中表条件结果、行动目的的关系相对较为专门和稳定。^②

汉语中也有不少例证。石毓智通过探讨介词的演变过程指出介词通常是由一些携带施事者、受事者、工具、地点、时间等词类的次要动词语法化而来。这些次要动词因为使用频率很高，于是被逐步语法化为助动词，失去动词的语法特征，最终完全虚化为各类介词（石毓智，李讷2004: 390）。远的不说，现代汉语中也有类型情况正在发生。最近“有”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普通话中否定曾发生过某行为，我们一般使用“没有+动词+(过)”来表达，而肯定形式用“动词+了(过)”。不过从南方到北方，从年轻人到中年人，从口语体到主流书面媒体，肯定形式使用与否定形式对应的“有+动词+(过)”的情况频频出现，似乎处于语法化之中。例如：

(5) 李登辉：“台联也有参加游行啊，因为不参加，下次就没有人要投你了，没办法啊！领导人不要煽动老百姓啦！”（联合晚报 2007 年 9 月 16 日）

(6) 不过谢晖也谈到了他对自己继续国家队的愿望：“我和朱指导也一直有通电话，但在国家队中锋这个位置上在相互竞争的人选都是有着很辉煌表现的队员。”（2007 年 7 月 2 日某采访录音）

(7) 有见过这样边开车边看报纸的司机吗？（佳能在线摄影论坛）

(8) 记者：当初您把范廷钰招致山东队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曹大元：有想过，当初我发现他的时候就觉得肯定是一个能成大器的棋手，各方面条件都是下棋的苗子，他是特别聪明的孩子，性格上也适合下棋，非常用功。（新浪体育 2013 年 3 月 6 日）

“对于历时研究来说，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一些可比较类型的文献进行探索。让我们幸运的是少数语言有这样的文献”（Hopper & Traugott 2005: 130）因此针对方位词从上古到近代的演化问题，我们对上古、中古和宋元方位词的出现频率进行了对比。我们选择的是代表文献是《左传》、《世说新语》和《朱子语类》。^③请看下表：

表 1

文献与 频率 方位词	《左传》		《世说新语》		《朱子语类》	
	频次	频度	频次	频度	频次	频度
上	218	0.0011	139	0.0018	5998	0.0032
下	250	0.0013	222	0.0028	6317	0.0034
内	99	0.0005	46	0.0006	895	0.0005
外	156	0.0008	63	0.0008	1699	0.0009
中	161	0.0008	329	0.0004	6345	0.0033
里	0	0	47	0.0006	2564	0.0014
前	37	0.0002	65	0.0008	1916	0.001
后	284	0.0014	243	0.003	4399	0.0023
左	145	0.0007	68	0.0009	525	0.0003
右	168	0.0009	107	0.0013	318	0.0002
东	121	0.0006	114	0.0014	841	0.0004
西	71	0.00036	61	0.0009	629	0.0003
南	88	0.0004	72	0.0011	962	0.0005
北	93	0.0005	39	0.0012	426	0.0002
间	30	0.0002	39	0.0004	2436	0.0013
旁(傍)	1	0.000001	10	0.0001	170	0.00009
边	0	0	19	0.0002	668	0.0004
侧	13	0.00001	12	0.0002	67	0.00004

根据上表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中前三位的高频单音方位词依次为“后”、“下”、“上”；《世说新语》中前三位的高频单音方位词也是“后”、“下”、“上”；《朱子语类》中前三位的高频单音方位词依次为“下”、“中”、“上”。说明这些方位词的语法化程度相对其他来说比较高。“里”则从无到有。《左传》中有一例：

(9) 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但上句中的“里”并非方位词。“里”最初是指衣服的里子，跟表相对；到东汉时出现了表典型三维空间的方位词里“里”，但还不多见；其使用是从魏晋才开始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到了南北朝“里”在文学语言中普遍使用，使用频率很高，组合关系方面也产生变化。

到了现代汉语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是“上”、“里”、“中”。吕叔湘（1965）

指出这三个高频词的用例和搭配面大大超过其他单音方位词，在意义泛向性方面的表现也尤为突出，其词汇意义逐渐衰弱，而语法意义逐步显现。

根据上表的数据，从历时纵向轴上看，从《左传》到《世说新语》再到《朱子语类》，单音节方位词的使用频率大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上”、“中”、“下”、“间”等几个。可以说，使用的高频化的确有助于语法化现象的发生。某语言成分的使用频率越高，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 语法位置的后置化

从理论层面讲，这可以说是语法化的“句法位置变化”因素。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曾指出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在汉语中，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谓—宾”组合格式，不是一个句子唯一的动词，并且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该动词的动词性就会减弱。当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所以他们推导出近代汉语的动态助词都是由动词演变而来，大多经过“连动式中的后一动词→谓语动词的结果补语→动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

李崇兴（1990）指出，近代汉语“问取他去”这类句式“去”的位置为助词“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问取他”是重点所在，“去”处于次要地位，两个连用的动词性成分在语义上不平等，次要成分的语义容易被轻视，因而也容易虚化。

语气词的衍生也是如此。句末位置固化是产生语气词的途径。李小军（2012）指出，一个词或结构式的语法化最初总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而后再通过语境扩展或言语社团的扩散进而达到语法演变。以“在”为例，“但存物外醉乡在”、“应有太平时节在”中尽管“在”的动词性非常明显，但是如果删除，句子在语义表达上仍然可通，在交际中也不会产生歧义。这正是“在”的句法位置造成的，因为“在”处于次要动词的地位，而其前的动词又带有一定的“存在”义，因而在句法和语义表达上就削弱了“在”存在的价值。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到这些“在”语义表达功能的弱化，造成“V+NP+在”式在语义上前重后轻。如果“在”的动词义进一步虚化，与前面的“V+NP”在语义上的联系彻底消失，这时的“在”就是较典型的气

词了。如：

(10) 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杜甫《因许八奉寄江宁上人》)

“于”是古代汉语中典型的介词，但是在现代汉语中经常性地出现在一些动词后面，比如有“善于”、“勇于”、“毕业于”、“死于”、“生于”、“成立于”等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介词‘在’、‘向’、‘于’、‘到’、‘自’等可以直接附着在动词或其他词语后边，构成一个整体，相当于一个动词”^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里的“于”已经不是古达汉语中的介词了，早已语法化了，可以看成动词在构词上的词类标志，把“于”视为构成动词的词缀。

那么如何看待宋元时期放置在其他词语后的方位词呢？我们认为方位词演变、分化的导火索就是方位词后置，后置是方位词语法化的“触发者”。

前面我们说过先秦时期方位词多独立使用，方位短语形式从汉代开始有所增加，但只有到了宋元以后的近代汉语里，方位词才真正大量以方位短语的形式出现。通过数量统计来看这个事实，就再清楚不过了。方位词的语法化主要是单音节方位词的语法化。下面是宋元七种文献中的方位词后置率（即用于构成方位短语）情况：

表2 宋元时期单音节方位词后置率表

方位词 后置率	上	下	内	外	中	里	前	后	左	右	东	西	南	北	间	旁	边	侧
刘知远诸宫调	97	100	100	71	100	100	75	87			100	0	0		100	50	100	
大宋宣和遗事	78	84	37	41	94	100	45		0	0	30	13	6	13	100	43	100	90
大唐三藏 取经诗话	86	67	87	75			14	17	0	0	50	0			100			
错斩崔宁	89	83	50	0	100	93	50	57	0	0					100	100	100	
碾玉观音	90	88	100	100	100	100	82	40	0	0	0			0	100			
简贴和尚	75	83	100		100	100	86	91	0	0	100			0				
朱子语类	75	54	63	47	82	100	27	45	0	0	10	0	10	25	100	35	100	88

通过以上的语料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比率上，方位短语在宋元时期都占到了统治地位。

从方位词之间的比较看，“上”、“下”、“内”、“外”、“中”、“里”、“间”、“旁”、“边”“侧”的后置率比较高，构成的方位短语比较多，而“左”、“右”、“东”、“西”、“南”、“北”等独立性比较强，构成的方位短语很少。

下面我再来看看上古汉语代表文献《左传》的情况：

表3 《左传》单音节方位词后置率表

方位词	上	下	内	外	中	前	后	左	右	东	西	南	北	间	侧
后置率	25.7	28.4	16.1	31.4	22.3	18.9	4.2	1.4	0.5	6.6	14	7.9	6.5	88.6	69.2

通过《左传》与宋元文献中的方位词后置情况看，宋元时期单音节方位词的后置率大幅攀升，因而为单音节方位词语法化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2.3 认知作用

认知因素在方位词的语法化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语言发展的客观趋势，语法化现象通过主观的认知作用而得到确认，并最终得以完成其虚化过程。

在认知语言学中，辖域指被激活的概念内容的配置。认知域和辖域基本相当。认知语法描写词语的意义时主要用“认知域”来代替传统的意义特征，将意义视为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认知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内在的、连贯的、凝聚在一起的范围，可基于其进行语义描写。认知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即基本认知域），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具有百科性。基本认知域包括：三维空间、时间、嗅觉、颜色、触觉、感情等；复杂认知域具有程度性、抽象性，如象棋规则、亲属关系等。认知语法认为，基本认知域是人类概念化形成的出发点，在这一基础之上，人类通过认知能力和方式逐步形成了其他许多间接的、抽象的、复杂的认知域，可称为“概念复合体”。人们对每一事物的认知是以认知域为背景或基体的。有些语义只涉及一个认知域，有些语义要包括多个认知域。一个词项可唤起一系列的认知域作为意义的基础，展现出语义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王寅2006: 25-26）。

方位词的语法化归根结蒂就是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转变的的认知心理过程。通过观察世界各种语言的表现，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认知发展规律是先空间、再时间、再性状，空间、时间和性状组成一个认知的连续统。

赵艳芳（2001: 48）认为“从语言发展和儿童先学会表示空间概念，后学会表示时间概念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看，可以作出推论：在人类认知发展的连续体中，空间概念的形成先于时间概念。根据方位主义的观点，空间关系及其词语是最基本的，这可能因为人的最初感知是从感知自身运动和空间环境开始的。在认知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用于空间关系的词语后来被用来喻指时间、状态、过程、关系等等抽象概念，这是概念隐喻认知的结果。”

隐喻的前提是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相似有物理的相似和心理的相似

性之分，相似性还有程度上的不同。物理的相似性可以是在形状或外表上、功能上的一种相似，心理相似性是指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素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某些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很大，某些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很小，有些事物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相似性。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利用事物之间人们已经感受到的相似性，把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而创造性的隐喻则将原来并不被认为其间存在这种相似性的两个事物并置在一起，构成隐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投射或映射是不对称的，是部分的。

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是客观世界无数范畴和关系中的一种，任何抽象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或属性关系从本质上说都是具体空间关系的隐喻形式。具体空间范畴就是“源域”。而相关的目标域可以有：抽象空间域、范围域、媒介域、场所/场合域、工具域、等级域、时间域、方面域、身体部位域、序列域、数量域等等。我们在宋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多音节方位词一般表达空间范畴，即使单音节方位词也表示空间范畴为第一。比如“上”，在《简贴和尚》中一共28例，其中有24例就表示空间范畴；再比如“东”、“西”、“南”、“北”等更是只表示空间范畴了。在此基础上，通过隐喻，将空间认知域投射到其他认知域。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一些“上”：

(11)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简贴和尚)

这里“法场”不是起承载作用的支撑面，而是一个活动的场所。

(12) 上有九畴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阵之法。(朱子语类)

上例中的“上”、“下”我们不知道具体哪儿是上哪儿是下，这里所谓“上”和“下”不过是人们抽象的心理上的空间而已。因为和具体空间之间有相似性，所以人们就具体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了这种抽象空间中。

(13) 上两句正是‘天命之谓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谓道’。(朱子语类)

这里是源域投射到了序列域中。先出现的为“上”，后出现的为“下”。

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一样，也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很多语言中，时间的表达都是借助空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时间是空间的隐喻。宋元时期前置或单用“上”、“下”、“前”、“后”的时候就可以将原有的空间语义投射到了时间域，经历了一个从空间到时间的隐喻过程。例如：

(14) 看来固当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废法，又如何当官！（朱

子语类)

(15) 僖祖有庙，则其下子孙当祧者置於东西夹室，於理为顺。(朱子语类)

(16) 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后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大唐西域取经诗话)

在宋元方位短语中，“前”、“后”、“中”、“间”等也都可以从空间域转移到时间域，它们往往是通过对事物或事件的空间定位来实现对事物、事件的时间定位的。这些方位词可以放在朝代、年号之后，放在事件名词之后，放在动词性词语之后，有时也可以放在指示代词“此”、“其”、“是”之后。“此”、“是”分别对前一事件进行复指，表明后一事件是以前一事件为时间参照。这些空间方位词完成了从空间范畴到时间范畴的转化。举例如下：

(17) 且说英宗皇帝治平年间，洛阳邵康节先生因与客在天津桥上纵步闲行，忽听得杜鹃声，先生惨然不乐，问其故。(大宋宣和遗事)

(18) 有诗道：“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碾玉观音)

(19) 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作何气象。李先生以为此意不惟於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朱子语类)

(20) 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孙被武后杀尽，其间不绝如线。(朱子语类)

3. 宋元时期方位词认知域的分布与语法化程度

3.1 影响语法化程度的参数

语法化是对具体的语言形式、语义内容和语用因素的抽象，与原来的意义相比变得较虚。一般来说语法化主要具有单向性的特点，从实变虚，从虚变得更虚，因此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其抽象程度会有较大的层级性差异。一个语法项目的抽象化程度越高，其语法化程度也就越高。

Heine (1991: 157) 将语法化看做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他将人类认识世界的认知域排列成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等级，认知域之间映射的一般顺序为：Person 人 > Object 物 > Process 过程 > Space 空间 > Time 时间 > Quality 性质。

吴福祥 (2006: 94) 指出：“语法化程度是共时语法化研究中常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一个语言的共时平面上不同的语法范畴之间往往具有语法化程度的高低，而这种差别可以通过若干参数加以测定。”他在判定两次范畴语法化程度时认为至少有“文本频率（即量／单位词在数量结构中的使

用频度)”、“句法行为（即‘数+量/单位词+名’与‘名+数+量/单位词’的比率）”等几个参数。

Lehmann (1995: 122) 为了衡量语法化程度，从语用角度引入了一系列量化的参数，也可供我们参考。首先他指出符号的自主性与其语法化程度成反比关系，即符号使用越自由，它的自主性就越强，同时也意味着语法化程度越低。Lehmann 认为自主性主要依靠三个方面来确定：权重、衔接和变异性。权重是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同类成员的特性，并且赋予了该符号在组合体中的突出性。当符号语法化程度变高时，其自身权重降低；衔接是指一个符号与其它符号间的“缔结”的系统关系中内在的方面，随着衔接的产生，符号自主性降低，而符号语法化程度加强；变异性是指相对于其它符号的暂时流动性或移位性，符号自主性越强，其变异性越强。反之当符号语法化程度变高时，其变异性降低。

具体到方位词，汉语多音节方位词相对简单，一般表示空间，语法化程度低，单音节方位词则相对复杂。语法化程度的参数可以包括：语音弱化、句法位置后置化、去范畴化、语义虚化等四个方面。

语音弱化在现代汉语里很容易判别，比如后置的“上”、“里”等都读轻声，但宋元方位词的语音问题比较复杂，或者说很难判断，我们这里不作探究；位置后置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这里我们主要谈一下去范畴化。

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是人类思维、感知、行为和言语的最基本能力，是把不同的事物、语言单位归为同一个类型的过程，语言则是事物范畴化以后结构的直接体现。人类总是从自身到外部世界、从具体到抽象，把最基本的空间范畴概念投引到其他范畴中去，而这每一个范畴便都构成了人类思维、感知等行为的一个概念域。在语言发展演变中还存在与之相反的过程，语言单位会丧失原有的语法属性，逐渐向新的语法范畴靠拢。Hopper & Traugott (1993: 104) 认为语法化过程往往伴随着词类范畴的去范畴化特征 (Decategorialization, 或称脱范畴化)，其去范畴化的降类顺序为：

Major Category (> Adjective/ Adverb) > Minor Category.

开放类的名词和动词是主要范畴，封闭类的介词、连词、助动词、指代词是次要范畴。形容词和副词则介乎两者之间。

方经民 (2004) 指出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处所名词逐渐次范畴化，一般名词表处所需要后加方位成分，而原来单纯统一的方位成分也在形式语义功能上开始分化，变得复杂起来。他将方位词分成四类成分，从范畴化的结果

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次范畴化，另一种是脱范畴化。方位名词是名词范畴内部的次范畴化，其余三类是脱范畴化。就单音节的方位成分而言，方向词是古语残存的脱范畴化，它是通过语义脱落（方向位置>方向）形成的。方位区别词是并入其他实词的脱范畴化，它通过语义转移（空间、时间）形成的。方位词是建立新的虚词类的脱范畴化，它是通过语义泛化（具体、抽象）形成的。

根据上述理论，从范畴化角度来看，宋元方位词语法化程度高者是“上、下、里、内、外、中、前、后、间、旁、边、侧”等，低者是“L+面/边/头/…”和其他多音节方位词。

3.2 方位词语法化程度的差异

现在我们主要从语义虚化角度也就是认知域的角度分析一下宋元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化程度。汉语是非形式化的语言，语义认知在汉语发展演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上古至宋元时期，方位词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意义，从一个范围扩大到另一个范围，逐渐引申出一种更为抽象概括的意义。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甚至原有的语义逐渐消失，逐渐虚化成表示方位的一种标记。总体上看，这是一个语义虚化、泛化（generalization）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概念域转移的过程，呈现出了“空间域→时间域→性质域”的演变链条。李晋霞、刘云（2006）曾考察现代汉语单音方位词在语法化上的非匀质性，得出了单音方位词在语法化程度上的差异序列为：上>中/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那么宋元汉语方位词又是什么情况呢？每个方位词（主要指单音节）的语法化程度是否一致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同方位词的概念域的分布状况。列表如下：

上古至宋元时期方位词的语法化

表4 “上”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28	21	12	12	12	82	150	305	51.78	↓ ↓ ↓ ↓
场所/范围域	8	2		7	2	5	10	34	5.77	
媒介域		2	1		1	6	33	44	7.47	
等级域	1	2			1	3	24	31	5.26	
序列域		3					24	27	4.58	
时间域							8	8	1.36	
性质域					1	1	138	140	23.77	

表5 “下”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11	12	10	13	4	94	85	229	77.62	↓ ↓ ↓ ↓
场所/范围域						4	3	7	2.37	
等级域	1					5	18	24	8.14	
序列域							29	29	9.83	
时间域					1		1	2	0.68	
性质域				2	2			4	1.36	

表6 “内”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20	1	15	2	2	38	32	110	82.09	↓
场所/范围域	8		3				8	19	14.18	↓
时间域						1	4	5	3.73	↓

表7 “外”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1		2	1	1	62	114	181	86.19	↓
场所/范围域	6		3	1			19	29	13.81	↓

表8 “中”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33	14	25	28	22	165	278	565	67.1	↓ ↓ ↓ ↓
媒介域		1			1		98	100	11.88	
场所/范围域	16		15	2	13	17	8	71	8.43	
等级域						2	10	12	1.43	
时间域		1				17	11	29	3.44	
性质域	4	1				6	54	65	7.72	

表9 “里”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12	26		26	13	21	2	100	81.97	↓
场所/范围域	9	1			2	8		20	16.39	↓
时间域	1						1	2	1.64	↓

表10 “前”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25	12	42	9	7	64	60	219	61.69	↓
序列域							7	7	1.97	↓
时间域	4	4	9	3	7	25	77	129	36.34	↓

表11 “后”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2		1	3		13	13	32	9.66	↓
序列域						4	20	24	7.25	↓
时间域	24	11	5	4	22	54	155	275	83.1	↓

表12 “间”的概念域分布

语料出处 概念域	刘	简	唐	碾	错	宋	朱	总数	比重%	虚化程度
空间域	1			1	3	24	58	87	34.25	↓
场所/范围域	3	3	5		2	16	56	85	33.46	↓
时间域	2	5	2	3	7	13	50	82	32.28	↓

“上”横跨空间域、场所/范围域、媒介域、等级域、序列域、时间域、性质域等概念域，其中用于空间域最多，约占51.78%，场所/范围域5.77，媒介域约占7.47%，等级域约占5.26%，序列域约占4.58%，时间域约占1.36%，抽象度最高的性质域约占23.77%，按照数量多寡我们可以排出如下“上”的概念域等级序列：空间域>性质域>媒介域>场所范围域>等级域>序列域>时间域。

“下”分布在空间域、场所/范围域、等级域、序列域、时间域、性质域，其中空间域为优势用法，约占77.62%，场所/范围域约占2.37，等级域约占8.14%，序列域约占9.83%，时间域用法极少，约占0.68%，性质域约占1.36%。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序列域>等级域>场所范围域>性质域>时间域。

“内”分布于空间域、场所/范围域、时间域，其中空间域约占82.09，场所/范围域14.18%，时间域3.73%。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场所范围>时间域。

“外”只分布于空间域和场所范围域，其中空间域约占86.19%，场所范围域约占13.81%。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场所范围域。

“中”分布在空间域、媒介域、场所范围域、等级域、时间域、性质域，其中空间域约占67.1%，媒介域约占11.88%，场所范围域约占8.43%，等级域约占1.43，时间域约占3.44，性质域约占7.72。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媒介域>场所范围域>性质域>等级域>时间域。

“里”分布在空间域、场所范围域和时间域，其中空间域约占81.97%，场所范围域16.39%，时间域1.64%。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场所范围域>时间域。

“前”分布在空间域、序列域和时间域，其中空间域约占61.69%，序列域1.97%，时间域36.34%。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时间域>序列域。

“后”分布在空间域、序列域和时间域，其中空间域约占9.66%，序列

域7.25%，时间域为优势用法，约占83.1%。其等级序列为：时间域>空间域>序列域。

“间”平均分布于空间域、场所范围域和时间域，其中空间域约占34.25%，场所范围域33.46%，时间域32.28%。其等级序列为：空间域>场所范围域>时间域。

其他的单音节方位词，“左、右、东、西、南、北、旁、侧”仅限于空间域。

从以上分析我们观察出以下两个特征：单音节方位词的内部差异很大，每个方位词由空间范畴向其他范畴转变的能力并不相同，即在概念域的抽象引申方面能力不同。有的是在空间域占有优势，而有的是时间域具有优势。与之相关，这些单音节方位词的语法化程度也便不同。“左、右、东、西、南、北”通常只用于空间域，语法化的程度最低；“边、旁、侧”虽然也只用于空间域，但位置固定，当属次低；“外”不用在时间域，所以语法化程度比“内、里”低一些；“间”的时间域用法有一定的优势地位，所以语法化程度排在“内、里”之前。“上”不仅用于空间域，还广泛用在空间域、场所/范围域、媒介域、等级域、序列域、时间域、性质域等概念域，且用于性质域的比例也比“中、下”大，所以其语法化程度为最高。这样我们可以把近代汉语宋元时期单音节方位词的语法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为：

上>中>下>前/后>间>内/里>外>边/旁/侧>东/西/南/北/左/右

注

① 方经民先生认为现代汉语方位成分已经分化为以下四种类型：

I. 自由不定位：加后缀“面、边、头”的派生方位成分，以方位成分为词根的复合方位成分；表时间的“以前、以后、以上、以下”

II. 半自由定位：东、西、南、北、左、右、上方向、下方向、前方向、后方向、里方向、外方向

III. 半粘着前加：上时间、下时间、前时间、后时间

IV. 粘着后置：里（内）、外、上、下、前、后、间、中、旁、边，加前缀“之”的派生方位成分，加前缀“以”的派生方位成分（除“以前、以后、以上、以下”），上下、前后、左右

② 参见徐盛桓，A and B 的语法化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 (1).

③ 《左传》的方位词数据转引自梁桦2006年暨南大学硕士论文《〈左传〉方位

词研究》。此表是对三种文献中的方位词的一个模糊统计，非准确数据。特别是“里”和“后”还需人工干预，比如《世说新语》中“里”，我们统计是47例，但很多是数量词用法，而方位用法仅7例而已。不过，个别情况不能否定整体数据的科学性。

- ④ 参见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

参考文献

1. 储泽祥. 汉语空间方位短语历史演变的几个特点 [J]. 古汉语研究, 1996 (1).
2. 方经民. 现代汉语方位成分的分化和语法化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2).
3. 冯胜利.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4).
5.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6. 蒋绍愚, 曹广顺. 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 李崇兴.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 [A]. 《近代汉语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8. 李晋霞, 刘云. 从概念域看单音方位词语法化的非匀质性 [J]. 语言科学, 2006 (7).
9. 李小军. 先秦至唐五代语气词的衍生与演变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梁桦. 《左传》方位词研究 [D].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11. 刘坚, 曹广顺, 吴福祥.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J]. 中国语文, 1995 (3).
12. 吕叔湘. 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 [J]. 中国语文, 1965 (3).
13.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纵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4).
14. 石毓智, 李呐.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5. 王寅. 认知语法概论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16. 汪维辉. 方位词“里”考源 [J]. 古汉语研究, 1999 (2).
17. 吴福祥.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1).
18. 袁毓林. 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5 (1).
19.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0. Bybee, John, R. Perkins & W.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1. Heine, B. et al.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 Framework*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2. Himmelmann, N. P.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A].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omponent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4.
23.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4. Lehmann, C.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 Munich: Lincom Europa. 1995.
25.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localizers from ancient to Song and Yuan Dynasty

ZHANG Jin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rs, examining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period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The localizer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had developed into three types in the course of grammaticalization: free-located, semi-free-located, and post-attached,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cognitive factor, high frequency, and postposition of syntactic componen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mantic division, semantic overgener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cross genres. The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localizers in the Song Dynasty varied greatly. The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main single syllabic localizers can be put in this order: shàng>zhōng>xià>qián/hòu>jiān>nèi/lǐ>wài>biān/páng(bàng)/cè>dōng/xī/nán/běi/zuǒ/yòu.

Keywords: localizers, grammaticalization, late of postposition, conceptual domain, metaphor